



合同外包与垂直一体化

——在华外资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王根蓓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资助项目

合同外包与垂直一体化 ——在华外资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王根蓓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同外包与垂直一体化:在华外资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王根蓓等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642-0988-9/F · 0988

I. ①合… II. ①王… III. ①合同承包:对外承包-研究-中国
IV. ①F75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3111 号

责任编辑 李成军

封面设计 张克瑶

HETONG WAIBAO YU CHUIZHI YITIHUA

合 同 外 包 与 垂 直 一 体 化

——在华外资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王根蓓 等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 @ 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上海竟成印务有限公司装订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8.375 印张 209 千字
定价: 26.00 元

导言

如果说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疾风暴雨”式的经济一体化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宏观组织基础和制度框架的话，那么，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和风细雨”般的经济一体化和合同外包则培育了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基础和制度框架。由这两股“滚滚洪流”和“涓涓细流”交相呼应汇聚而成的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人、企业、集团和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难解难分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攸关方！本书的主要内容，则属于我们从这股经济利益彼此交融与相互竞争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采集的几束浪花——它们折射或反映了国内外学者和我们自己对这场国际经济巨流的点滴看法。

理论评述和实证分析，是本书的两个主要着眼点。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理念，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和剖析了国际贸易学者和国际商务学者分别从企业合同外包和垂直一体化以及企业国际化和市场进入模式等不同视角对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发育、成长和发展的轨迹、原因和趋势所作的理论剖析。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中国作为经济大舞台，将在华外资企业作为经济主角，

合同外包与垂直一体化

应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考察其组织行为变迁的特征和缘由。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高潮期,中国与时俱进地采取以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近 30 多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全球制造业的跨国转移机会,以 ODM 和 OEM 模式为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基本方式,即制造业外包的方式加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成功地参与了国际分工,它才有幸成长为“世界工厂”,并且正经历着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FDI 的“接受国”向“投资国”的转化。因此,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即“中国模式”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普遍寓意和参考价值,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且将“中国模式”作为“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外一种共识,即“北京共识”来研究。同时,在国际贸易、商务、投资和管理领域内的许多最前沿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均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正如 Child 与 Tse(2001)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且最独特的转型经济,对国际商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 Toyne 与 Nigh(1998)则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性质挑战了现有的国际商务理论的解释能力。无疑,解释和揭示中国这种以市场化和开放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体制转型和微观组织创新发生、发展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作 者

2011 年 5 月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

第 1 章 生产力异质性、不完全合同与经济全球化微观组织的核心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的考察 / 1

1. 1 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的全新变化对传统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挑战 / 1
1. 2 贸易、投资与企业组织的传统研究方法 / 6
1. 3 生产力异质性、不完全合同与企业组织的现代研究方法 / 8
1. 4 Ricardian 连续统模型、Chamberlin-Heckscher-Ohlin 模型：企业组织的现代研究框架 / 17
1. 5 结语：理论评析 / 21

第 2 章 所有权优势、文化距离和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

——基于国际商务视角的考察 / 32

2. 1 进入模式：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的新考察视角 / 32
2. 2 进入模式的分析范式 / 38
2. 3 结语：理论评析 / 52

合同外包与垂直一体化

第3章 合同外包的界定/68

- 3.1 合同外包的界定/68
- 3.2 外包分类/70
- 3.3 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特征与趋势/75
- 3.4 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成长/78

第4章 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力的动态演化

——基于主成分方法的实证分析/83

- 4.1 导言/83
- 4.2 理论假说与评价指标体系/86
- 4.3 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95
- 4.4 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优势的主成分分析/97
- 4.5 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竞争优势的综合与分项实力排名/116

第5章 生产力异质性、文化距离和在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

——基于世界500强企业的二元Logit模型分析/131

- 5.1 导言/131
- 5.2 理论假说和解释变量的选择/132
- 5.3 度量指标与数据来源/143
- 5.4 计量模型和估计结果/149

第6章 区位优势、文化距离与进入模式的选择

——基于ML-Binary 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173

- 6.1 导言/173
- 6.2 文献评述和理论假说/175
- 6.3 度量指标与数据来源/183
- 6.4 计量模型和估计结果/187

6.5 结语:实证分析的政策启示/198

第7章 不完全合同与企业内贸易关系的中国检验

——基于产业与企业水平数据的实证分析/214

7.1 国际贸易的不完全合同分析方法/214

7.2 不完全合同与企业内贸易模式的关系/215

7.3 不完全合同理论检验之一:中国的典型化事实/218

7.4 不完全合同理论检验之二:横截面数据与面板数据的回归/222

第8章 企业生产力异质性、合同外包与产业升级关系的中国检验

——基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分析/233

8.1 导言/233

8.2 关于企业生产力异质性、产业升级和贸易自由化三者相互关系的文献综述/234

8.3 度量指标、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237

后记/258

第1章

生产力异质性、不完全合同与经济全球化 微观组织的核心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的考察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二代区域主义的兴起与 WTO 的成立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宏观组织与制度框架, 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与发展。那么,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企业内贸易与企业间贸易的快速发展则重新塑造了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与制度框架, 它们所呈现的生产、投资与贸易的全新特征也挑战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建立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等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期力。因此, 经济实践呼唤经济学者创造新的分析框架与建立新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和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所发生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在这一章里, 我们主要阐述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的全新变化与典型实践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回应这种实践挑战时所采取的基本分析框架与核心研究方法。

1.1 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的全新变化对 传统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挑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整个世界经济以及作为这个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贸易、投资以及生产等众多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显著改变与重新塑造了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因此也对传统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形成了挑战。在这里，我们将阐述体现世界与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典型化事实。

1.1.1 世界经济的微观结构与组织变化的典型化事实

从全球视角看，世界经济展现了如下的全新特征：首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投资与贸易成为成长最快的经济活动。据《世界贸易报告 2008》统计，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1997～2007），世界真实贸易的增长率始终以高于全球产出两个百分点的幅度增长，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份额超常增长。与此同时，在 GATT-WTO 的主导下，尽管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关税壁垒的下降，特别是美、日、欧的平均关税削减了 90% 以上。但是，据 WTO(2000) 报告，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关税壁垒大致只下降了 11%，但在 1962～1999 年间，世界出口的关税弹性大约为 20，而制成品出口占世界 GDP 的比重大约上升了 3.4 倍。小幅的关税下降与大幅的贸易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成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一种典型的数量悖论。其次，与全球贸易和 FDI 的超常增长相伴随的，是企业生产在地理区位上所展现出的两种彼此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全球化特征：一方面，企业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割趋势日益加剧，即同一产品的生产由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企业共同完成——经济学家用国际合同外包、价值链的分割、垂直专业化以及全球生产分享等众多术语来描述这种生产的全球化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广泛观察的另一种现象是，一个国家的垂直相关且要素密度显著不同的企业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Agglomeration 或 Clustering）。临近性—集中性（Proximity-Concentration）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力

量在企业区位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再次,企业区位选择的变化也伴随着产业与企业组织的显著变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不同国家间的同一产业又呈现了垂直一体化程度不断降低的趋势,即出现了企业组织的“微型化”(Downsizing)、外包化(Outsourcing)或者西方企业的局部日本化(Japanization)趋势。这导致了那些通过合同关系确定上下游企业的商业联系的企业间贸易高速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某些产业则仍然出现企业垂直、水平或复合一体化上升的趋势以及企业内贸易的快速增长:据 UNCTAD(2002)统计,大约 1/3 的世界贸易属于企业内贸易。在 1990~2001 年间,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以每年 7% 的速度增加,远高于同期的货物出口与非要素服务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服务的 FDI 的超常增加,服务贸易量占 FDI 流量的 2/3。最后,与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相伴的是中间品贸易的高速增长——这种贸易发生在企业边界内外。以美国为例,据 Zeile(1997)的统计,在 1994 年美国 42.7% 的进口贸易与 36.3% 的出口贸易为跨国公司的企业内贸易。其中,主要商品为中间投入品并且出口产业的资本技术密度越大,企业内进口占总进口的份额越高。相对于传统贸易,企业内贸易的显著不同有两点:其一,从产业结构上看,它高度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二,从国家分布上看,它们大部分发生在北方资本充裕国。而且非标准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由在北南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内部交易——属于企业内贸易,而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由在北南的企业之间交易——属于企业内贸易。

1.1.2 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改造中的中国因素

同上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相伴随的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的崛起: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了 30 年

的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67%，比同期世界经济 3.3% 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了 6 个百分点，分别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速度高 7.3 和 3.3 个百分点，最近 4 年中国的 GDP 更连续呈现两位数增长。^[1]

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速度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扩大：1978～2009 年间，中国 GDP 从 1 473 亿美元增长到 5.01 万亿美元，经济总规模增加了 14 倍，每资本的 GDP 增加了 8 倍，中国 GDP 占世界的份额由 1973 年的 4.6% 上升到 7.3%。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 WTO 的统计，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206 亿美元增长到 14 221 亿美元，增加了 68 倍。其货物出口与进口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已分别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8% 与 1.5%，上升为 2009 年的 7.5% 与 6.3%，成为排名超越德国的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其商业服务的出口与进口总值在 2005 年分别达到 739 亿美元与 832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进出口国；从 1993 年起，中国已连续 14 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投资接受国。截至 2006 年末，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59 万户，累积接受投资总额为 6 345 亿美元。与此同时，国家外汇储备从 1.67 亿美元增加到 8 189 亿美元，增加了 4 902 倍，2006 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

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贸易与投资的增长速度，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以制造业外包服务，即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模式——不仅吸引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如 Amiti 与 Wei(2005), Antràs 与 Helpman(2004), Feenstra 与 Hanson(2005), Cheng, Qiu 与 Tan

[1]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 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2 页。

[2] 世界贸易组织：2006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http://www.wto.org/english>。

(2005), Spencer(2005)以及 Melitz(2003)将中国出口导向型作为其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考察重点。同时,它也引起国际政治学家与战略家的瞩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及其对更大实力地位的逐渐获取已引起了某种程度的焦虑。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已成为新千年的迷惑。”^[1]“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在本国实现其中那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

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的崛起,已经并且继续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它们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何种企业适宜于服务外国市场?它们将选择何种模式进入并服务于国际市场?是通过出口还是借助于 FDI?它们将如何选择生产组织?它们为何采用合同外包或企业一体化?在什么条件下它们选择国际而非国内外包?如果企业选择一体化战略,在什么环境下,它们选择通过 FDI 在国外而非在国内进行一体化?即外国外包服务将中国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供给地的原因是什么,哪种企业可能成为外国外包服务的选择目标?为什么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外包其服务的活动频繁发生?为什么中国企业向外商外包其生产的活动很少?或者为什么这两种外包服务在中国很少并存?“世界经济的新发展触发了旨在更好理解贸易与投资模式变化,以及关于跨国生产的重组的研究。尽管传统的贸易理论已经提供了对这些更多的、令人迷惑的经济现象的部分解释,但是其他部分现象则要求新的分析方法”。^[3]

[1] Bertrand(2002), p. 1.

[2] 雷默:“北京共识”第 12 页,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校对,<http://www.tecn.cn>,2005 年 1 月 15 日。

[3] Helpman (2006), p. 626.

1.2 贸易、投资与企业组织的传统研究方法

国际投资与生产作为一种跨国的经济活动实践,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样漫长的历史,东印度公司可以算作这类活动的代表。但是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与生产当作考察重点的学术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换言之,这种学术实践距今有半个世纪。为了系统地展示有关贸易、投资与企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的历史演变,清楚地解释传统与当代研究框架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与本质变革,我们在这里简要论述有关贸易、投资与企业组织问题的传统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

除Vernon(1966)之外,在传统的研究框架下,主流的经济学家往往将贸易、投资与跨国公司分别作为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生产活动的独立领域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贸易问题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以生产要素只在国内流动而不在国际间流动为前提。同理,投资与跨国公司问题的基本范式是将产品与服务的国际交换作为既定的前提,独立考察国际投资,特别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生产和以资本流动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1.2.1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国际贸易视角的宏观考察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是以生产要素的国际不流动的假设为基础、以国家为核心的考察对象来研究产业间贸易的发生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其中,Samuel-

son(1948,1953)建立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1],间接地预示着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即在没有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的条件下,贸易的自由化必然导致国际间生产要素价格与收益差异的消失。因此,它必然消除了以资本国际流动为基准的国际投资的必要性。Mundell(1957)则采用存在两个技术相同的贸易国的资本流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一个与此相反的命题,即在货物贸易不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以资本为主体的国际投资也可以导致相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与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这个命题表明国际要素流动,或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

1.2.2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与互补关系:资本流动视角的宏观考察

对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的考察,经济学家最初是从资本流动的宏观视角进行分析的。Fleming(1962)与 Mundell(1963)分别独立建立模型,系统分析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体制性下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由于 Fleming(1962)和 Mundell(1963)各自的模型在分析结构与研究问题上存在的共通性,人们将他们的模型合称为 Fleming-Mundell 模型;几乎同时,Jassay(1960)、McDougall(1960)与 Kemp(1964)建立一个存在两种要素、一种产品、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福利后果。随后的经济学家如 Johnson(1967)、Grubel 与 Scott(1966)以及 Berry 与 Soligo(1969)应用上述模型分析了国际劳动力流动问题。同样,人们将由 McDougall(1960)与 Kemp(1964)发展的模型合称为 McDou-

^[1]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是对 H-O 理论的一种扩展,因此人们又称之为 Heckscher-Ohlin-Samuelson 定理。

gall-Kemp 模型。

与只关注于资本流动的福利效应的 McDougall-Kemp 模型不同, Kemp(1966)和 Jones(1967)建立了具有基本的 Heckscher-Ohlin 生产结构、资本流动与技术差异的 Kemp-Jones 模型, 探讨了贸易、关税与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后 Purvis(1972)、Chipman(1971)以及 Jones 与 Ruffin(1975)采用 Kemp-Jones 模型探讨了资本流动对贸易模式、专业化与贸易条件的影响, 并且分析了 Kemp-Jones 模型的李嘉图性质。这些分析证明, 在存在完全的资本流动的情形下, 首先, 如果贸易模式反映了技术差异而非要素禀赋, 贸易方式是李嘉图性质, 则至少一个国家必须专业化。其次, 沿世界生产可能性曲线, 可能存在比较成本优势的逆转。再次, 国际资本流动与货物贸易可能是互补关系而非 Mundell(1957)的替代关系。Brecher 与 Diaz-Alejandro(1977)、Markusen 与 Melvin(1979)以及 Bhagwati 与 Brecher(1980)证明: 首先, 在存在关税的条件下, 资本注入或流出可能导致贫困化; 其次, 完全的资本流动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最优关税策略。

1.3 生产力异质性、不完全合同与企业组织的现代研究方法

与那种将贸易、投资与跨国公司放在三个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领域进行孤立考察的传统分析方法不同, 现代研究框架则是将贸易与投资视为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两个彼此联系与互为因果的内容, 应用企业生产力异质性与不完全合同这两个核心分析方法, 来研究企业从事利润最大化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最优组织模式选择。在这里, 我们从核心研究方法与基本分析框架两个方面, 阐述经济学者为了解答由那些已经并且继续改变着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的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以及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理论问题而建立的企业组织的现代研究框架。^[1]

1.3.1 贸易的企业生产力异质性分析方法 (the Firm Heterogeneity Approach to Trade)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自 Krugman(1979)、Helpman(1981, 1984)以及 Helpman 与 Krugman(1985)建立 Chamberlin-Heckscher-Ohlin 分析范式以来,贸易理论正式引入了由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导致的产业内生产力异质性。但是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解释企业间生产力与规模的非对称性,而是旨在解释 Grubel-Lloyd 悖论,即世界贸易的 50%以上属于在生产要素构成上相似的经济体或国家之间进行的相似产品贸易,也就是产业内贸易——它们涉及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的差异化产品。这种产业内贸易基准的研究目标要求经济学家忽略企业水平的生产力与规模的差异。因此,基于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的贸易理论大部分假设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间生产技术的对称性,即企业具有相似的生产力水平与贸易参与度。“垄断竞争模型意味着所有企业向

[1] Oviatt 与 McDougall(1994), Jolly、Alahuta 与 Jeannet (1992), Knight 与 Cavusgil(1996)以及 Madsen 与 Servais (1997)等国际商务的研究者从跨国公司视角提出了现代加速国际化成长模式,即由具有丰富国际性经验的个人通过在多个国家筹集资本而建立的以独特技术资源为基础,以发现与利用多国商业机会为目标的新型国际性企业的成长模式。他们将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视为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其创立时期便主动适应环境挑战、承担风险的加速国际化的进程。此外,他们将参与这个过程的企业称为新型国际性企业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如 Oviatt 与 McDougall(1994),或称为高新技术启动企业 (High Technology Start-Ups)。如 Knight 与 Cavusgil(1996)以及天生全球化企业 (Born Globals),如 Madsen 与 Servais (1997)。这些内容也是关于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与组织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我们不再详细论述。